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3.06.010

卡尔·波兰尼的市场经济思想及其政治价值^{*}

张亚甫,钟文圣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苏州 215123)

摘要:卡尔·波兰尼批判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乌托邦,自由市场和社会自我保护的“双重运动”使得自我调节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并由此构成社会的大转型。自由市场催生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本质上与人类的根本境况相关,人之境况是社会与政治的源泉,政治行动在维护社会与市场平衡中具有重要意义。政治价值规导下的互惠经济能够与社会友好合作,具有互惠性与公共性内涵,启示我们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坚持公平的政治价值和回归公共性。

关键词:市场;社会运动;政治行动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3)06-0069-06

卡尔·波兰尼(1886—1964)是20世纪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他成长于匈牙利,颠沛流离于英国和美国等地,耳濡目染社会变动,切身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带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与责任意识。自由主义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等著作中表达了崇敬和捍卫自由市场的立场。相比于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的极力赞美,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了对自由主义市场崇拜的著名批判,该书隽携丰厚的原创思想,散发着作为一部伟大著作的魅力,融入了他对市场经济、社会政治及其背后制度的长久持续关注,在对市场经济的争论依然存在的今天,重读波兰尼,对于认识当下的市场经济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巅峰背后的危机

波兰尼在开篇即介绍了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及其引发的大转变。他指出,19世纪的文明立足于四个奠基性制度之上,第一,用于防止大国之间发生任何持久的和破坏性的战争的实力均衡体系;第二,象征的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本位制;第三,造就空前物质财富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第四,自由主义国家。在波兰尼看来,这四个奠基性制度的根基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的市场是金本位制度的源泉和基体,而实力均衡体系是建构于金本位之上的上层建筑,自由主义国家本身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结果。波兰尼的主题思想也即: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

* [收稿日期]2013-07-27

[作者简介]张亚甫(1986—),男,山西泽州县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理论与方法研究。

钟文圣(1987—),男,福建武平县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毁灭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1]3}。紧接着,波兰尼以理论寓于叙事的形式从事实理据论证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导致社会深刻嬗变和灾难性后果,最先是金本位体制的崩溃引发世界性经济的瓦解,继而引起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断裂,使得人类文明之情势一别百年和平而进入动荡岁月,也使得30年代被冠之于革命的标签,战争、动乱的社会剧变又深刻地影响到家国命运,在制度变革之下的个人也势必难以获得自我权益的保障,而引发灾难的根本性源头就在于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

作为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波兰尼不会仅仅是陈述这一历史过程,他通过“嵌入”(embeddedness)和“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概念表达其主题。第一,“嵌入”概念,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自我完善的自足的体系,能够通过价格机制自动的调节供给与需求,“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1]15}。经济是作为一个自足的系统独立于政治系统和我们的社会之外的。自由主义深信市场是自生自发的,有着完美的自我纠正机制,人们的理性无法达到控制市场的地步,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代表,哈耶克认为人类始终存在“理性不及”和无知,“我们的习惯及技术、我们的偏好和态度、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都是我们对过去经验的调适,而这些调适水平的提升,乃是通过有选择地摒弃较不适宜的调适行为而达致的。”^[2]人们顶多是从经验中获取知识,永远无法实现对自生自发的自由市场的控制。波兰尼认为经济并非是自足的完全独立的体系,它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是社会大系统中与政治、宗教相容的子系统,并以此在社会整合过程中起着纽带的作用,经济是嵌入社会关系中的。故而波兰尼批判四大奠基性制度打破了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结构,经济开始如脱缰野马从社会大系统中“脱嵌”出来,成为“脱嵌”式经济,而市场秉持的动机就是获利,在经济理论中,人们做出的选择都是假定发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而预先做出判断,那么“长远”考虑是不可接受的,正义、道德等考虑都是其次的,

个人利益凌驾于正义之上的市场机制开始成为高高在上并主宰家国命运,由此引发了灾难性后果,这种经济由“嵌入”社会体系中到“脱嵌”于社会的过程,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大转型。第二,“双重运动”概念。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但波兰尼认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并不都是商品的,“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者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1]63}。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其实完全是虚构的,也即虚拟商品,正是虚拟商品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命运攸关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禁止任何可能妨碍市场机制沿着虚拟商品的路线而运转的安排,故而波兰尼认为经济从社会“脱嵌”是不可能的。而市场经济从社会“脱嵌”意味着市场经济要让自然和人类从属于市场,被剥夺了文化制度保护层的实体的“人”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中,自然界也将遭受到各种破坏,邻里关系和自然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食物和原材料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由此,社会必然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奋起反抗,即使经济已经自发调节,社会大系统内的国家也必须通过干预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才能有稳定的国家,所以波兰尼说19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是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1]66}可见双向运动的本质即“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它依仗贸易阶级的支持,主要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种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

组织的保护;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只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1] 114}波兰尼历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此后自由市场的复兴,《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但他的警世之言让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巅峰背后的危机和承载的社会巨变,至今引人深思。

二、人之境况:社会与政治的源泉

波兰尼认为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化为纯粹的商品,这必然会摧毁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他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从对市场模式演化的论述开始,首先是赤贫化问题,这就是1795年的“斯品汉姆兰法令”,该法令规定工资之外的津贴应通过与面包的价格挂钩,以便保证穷人能够得到一个最低的收入,而不论他们实际收入水平。该法令的初衷是为保护穷人的生存,但实际上从经济上得到保证的“生存的权利”却最终摧毁了它原本要救助的人。在斯品汉姆兰时期,人们普遍的观点认为,国力是人口构成的,所以人口应该尽可能地多;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制造业才能繁荣,通过济贫法等措施能够造就繁荣的国家,18世纪的人们意识到赤贫化增长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包括粮食的短缺;农业回报过高导致食品价格上升;农业工资太低;过高的城市工资,等等,以及在当时不被大众所知的隐形失业的增长等。对于赤贫化的理解,18世纪的思想家渐渐形成一种共识:贫困是伴随着富足一起成长起来的,贫困与进步之间密不可分。与此类似,人道主义者的贵格派教徒贝勒斯,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者欧文,蔑视平等的功利主义者边沁,他们都相信对失业者的适当组织必然能够产生出剩余,对于这些剩余,贝勒斯希望一次解救其他受苦者;欧文希望将其返还给劳动者本人;边沁希望将其馈赠给股东,但是正如波兰尼指出的,他们都没有揭示市场经济中赤贫化的本质。

随着人们对赤贫化的认识愈加深入,政治经

济学与社会发现开始映入眼帘。波兰尼引述《论济贫法》作者汤森的论文中关于山羊和狗的法则。该法则发生于太平洋智利的小岛,一个人在岛上放养山羊,以备自己前往小岛旅游时食用,山羊的繁殖速度很快,也成了海盗的食物来源,当时的西班牙政府为毁掉海盗在小岛的食物来源而放养了一只公狗和母狗,随着狗繁殖数量的增加,羊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于是实现了一种平衡,这也被称之为“自然主义”。这个例子,也正好说明了政治科学的一个起点,即从动物性方面探讨人类共同体,波兰尼列举了霍布斯对恐惧的体认而论证人们投奔主权者的例子,而市场原则也颇为类似,经济学家们也开始放弃人道主义基础,例如对于边沁而言,自由放任仅仅是意味着另一套社会动力机制,而且自然主义也渐渐成为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学科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一个社会的经济存在体现在价格的规律性与依赖价格的收入的稳定性中,实际上这也就成为了后来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的先声。实际上,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对此并非毫无察觉,诸如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对劳动者生存水平的关注,但最终无法扭转大势。当中,欧文可谓是一位富有远见的人,他看到市场经济这种新制度带来的显著后果,造成了定居人群传统特征的消逝,转而成为迁移飘荡的存在,并进一步指出市场经济影响下所产生的汇聚于此的原则对个体与社会的幸福都产生了伤害,对于劳动者生存条件的退化,是由于他们被置于一种比制造业工厂引入之前要退化和悲惨许多倍的境地中,但是现在他们的勉强生存却依赖于这些工厂的成功,对于欧文所揭示的劳动者生存本身被系于工厂,波兰尼指出:表面看似不过一个经济问题,本质却是一个社会问题^{[1] 111}。波兰尼揭示市场经济破坏着劳动者从前的经济存在所嵌入其中的那些同自然和人的关系,而贫困只是事件的经济方面,欧文宣布除非通过立法干预或者法律导向平抑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利一面,否则只会迎来更大的灾难后果,而这正是波兰尼所赞同的。波兰尼坚信,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赤贫化与政治经济学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背后即是社会。

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信条诞生后,实际上经历着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与干预主义的各种模式间的切换,在波兰尼看来,“集体主义”的反向运动并非是由于人们偏好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造成的,也并非是由市场机制本身具有哪样的缺陷,而是完全由受到扩张着的市场机制影响的广阔的根本性的社会利益造成的。社会共同体在市场模式演进伊始就初见端倪,“正是在斯品汉姆兰法令与济贫法改革之后的几十年中,人类的心灵带着新的、痛苦的关照转向了他自身的共同体:伯克郡的法官们努力创造的、并被济贫法修正案最终消除了的革命,使人们的视域发生了转向,他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集体存在,似乎之前大家曾忽视了它的在场。”^{[1]73}社会的存在感因市场的挤压而凸显,并最终汇成阶级运动的大流,“简而言之,所谓集体主义运动的根源,并不是单个的群体或者阶级,尽管其后果无疑受到了相关的阶级利益的影响。最终,使事情发生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利益,尽管维护这种利益的责任更倾向于落到人口中的这个部分而不是那个部分身上。看起来合理的做法是,不是将我们所描述的保护运动归因于阶级利益,而是归因于被市场所威胁的社会实质。”^{[1]138}社会运动的实质系于“人”的本身,正如波兰尼赞誉欧文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拒绝将社会划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反对人的商品化。

关于人的境况,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认为:人的境况有三种根本性的活动构成——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人造物品,为有死者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而行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3]2},劳动更多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即由生存必需性所驱使,呈现为强大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工作的实质也是制作,“制作,即技艺人的工作,是一个物化(reification)的过程”^{[3]107}。但是制作在把自然之物打造成人造物的过程中,本身具有暴力色彩和工具的目的性;行动摆脱了必然性的控制和强制暴力而具有自由,唯有行动

是最具有形式和内在美,“复多性”的人类通过言行彰显“真我风采”,行动中的人以平等的辩论和协商等行为方式交流,形成对共同世界之爱。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展示了她对人类共同生活的认可,在她看来,行动的空间即公共领域,“‘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不同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处所而言”^{[3]34}。公共领域是大家以行动的方式开创群体生活全新世界的空间。阿伦特不无遗憾地看到,社会的兴起吞噬了公共领域,阿伦特眼里的社会领域并非通常意义的概念,“她在谈论‘社会’时,并不是指人类关系的总和,而是指具有专门特征、具有特殊时空特点的一种特别的关系模式。”^[4]伴随社会兴起的是消费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基本逻辑,决定了消费主义是它必然的归宿,或者说,它必然将原本可以从‘动物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投身于公共领域、投身于‘行动’的人们引入、吸纳到无止境的消费中去”^[5],消费深具商品经济性,这同波兰尼论及市场从根本上打破人的整体性是一致的。阿伦特提出回归政治的解决办法与波兰尼不谋而合,而当时由市场调节所导致的国家实体间的债务和由此引发的纷争证实了,波兰尼指出必须要用政治行动才能获致世界经济平衡,加强政治在维持社会与市场平衡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三、互惠经济、政治行动与公共性的复归

作为一位市场批判者,波兰尼指出市场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制度,他提及19世纪以来的文明因市场“脱嵌”成功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这就解释了那个几乎令人无法相信的事实,即一种文明竟然会被一系列没有灵魂的制度盲目行为毁灭掉,而且这些制度的唯一目的仅仅在于让物质福利自发增长”^{[1]186}。波兰尼看到市场的逐利性打破了人的密切的相互关系,并指出政治应发挥其作用,背后是他深刻的人本意识,正如波兰尼垂暮之年说:“我的一生是‘世界性的’一生——我经历了人类世界的生活……我的著作是为了亚洲,为非洲,为新生民族而写的。”^{[1]13}他的市场批判理论所具有的公共性色彩,并致力于探寻一种市场、社会与人协调运转的经济模式。

波兰尼发现在市场机制之外存在着非逐利的人类社会之生产生活模式,即“对称”模式、“辐辏”模式和自给自足模式,以及分别对应的互惠原则、再分配原则和家计原则。波兰尼所考察的西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岛民的例子,说明了在市场经济之前的时期,不同于以“自利”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没有逐利动机、没有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省力的原则、也没有任何单独的和明确的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制度,依然能够保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这就涉及两个原则:互惠原则和再分配原则。“互惠仅仅在社会的性别组织——即家庭和亲属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再分配主要对所有那些在同一个首领支配下的人发挥作用,从而具有一种地域特征。”^{[1]41}互惠原则的运转是为了家庭和亲属的利益,并获得社会对自身良善行为的承认和获得荣誉,有助于维持生产和家庭生计。波兰尼认为再分配的原则是现存的劳动分工体系、对外贸易和公共税收以及防卫储备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从制度本身而言,作为一种生动仪式体验的再分配有着异常丰富的非经济动机。支撑互惠原则和再分配原则的社会组织结构分别是“对称”和“辐辏”模式,“对称”模式的对偶性“非常有助于个体之间结为成对的关系,并由此在没有永久记录的情况下促进了财务与服务的取与予”^{[1]42}。对称模式使得互惠行为能够广泛的延续。“辐辏”型制度模式在狩猎部落中,由于狩猎的特殊性质,产出往往是不规则的,成员通常将猎物交给头人来进行再分配。关于自给自足模式和家计原则,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家计和获利,家计更多是和家务管理联系在一起,“家务管理的技术必须既要准备好又要提供出对于家庭和城邦共同体来说为生活所必需的和有用的物品,这些物品都能够被贮存起来。它们是财富的真正要素”^[6]。家计经济的本质是非逐利的,为市场进行的附带性质的生产并不必然摧毁家计的基础。纵观波兰尼的思想,他认肯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的作用,他并非排斥市场经济,而是力图减少市场经济可能的不利后果,使人们在市场经济时代能够安然自在地生存,乃至诗意的栖息。

经济学家将波兰尼的互惠原则引申而来的经济模式称之为“互惠经济”,互惠经济是以文化和

习俗为基础并且以合作达成平衡的经济模式,“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是和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两种正式制度相并行的;作为一种方法论起点,它走出了‘结构—行动’的二元困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它是对地位结构观的超越。是市场转型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7]。互惠经济有着政治哲学的理据支撑,罗尔斯认为互惠是与人们的合作相关的,社会合作理念完全不同于纯粹的社会协作及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合作的观念包含了相互性和互惠性的理念,还包含了承担自己的责任的意愿,只要有其他人(或足够多的人)也承担其责任(合理自我节制的另一种说法)”^[8]。社会合作包含两个部分:第一,合作者都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合理利益,这与合作者的善或福祉有关,它包含有合理节制之意。第二,社会合作的条款是公平条款,这些条款涉及相互性或互惠性的观念,这出自于“理性的”。罗尔斯专门区分了“理性的”与“合理的”概念,认为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认为“理性的(及其相互性的理念)不是利他主义的(只为他人利益的公正行动),也不是只关注自我的(并只受其目的和感情驱使)”^{[9]49}。合理“适用于单个的主体和联合的行为主体(或为一个体,或为进行合作的个人),该主体在追求目的时具有其判断能力和慎思能力,也具有他自己特殊的利益所在。”^{[9]46}理性的(reasonable)是公共的、有远见并且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理念,实际上也道出了互惠的公共性内涵,而合理的(rational)不具有公共性,更多用来表示参与者以符合自身利益逻辑所采取的行动。事实上,罗尔斯指出互惠合作是以政治价值为保驾护航的,“政治价值是极为重要的价值,因之不能轻易僭越的,这些价值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我们存在的根基,并具体规定着政治和社会合作的根本条款”^{[9]128}。这也表明政治价值规导下的互惠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是友好合作的,而非如同自我调节市场与社会般的敌对关系,这就为处理市场、社会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波兰尼意识到互惠原则、再分配原则和家计原则有着特定的使用内涵,但它具有广阔外延和公共性意义,契合我国当下的社会经济情境,“事

实上,受中国社会结构和国家一体同构的长期历史传承的内在制约,不论现代市场机制的引入终究会发挥多大的作用,植根于中国社会深层次结构的互酬和再分配模式并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10]。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物质财富与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环境污染、道德滑坡和社会失范等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出现,这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波兰尼对市场的批判性看法。互惠经济交融于社会之中,对公共利益和善的呼唤,启示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应树立公平正义的政治观,应追求惠及全体人民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这些内容在福利经济学、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都有体现,这也与我们政府所提出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一致的。波兰尼对自由主义市场乌托邦的批判体现着对互惠性、社会合作和公共利益的容纳,以及政治维持社会与市场相互制衡的观点,对于政治行动干预以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减少市场带来的风险,为尽力维持社会公平和社会合作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国所坚持的市场宏观调控之于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同时,波兰尼也启示我们,在市场干预的过程中所必须坚持公平的政治价值,“干预应体现公平正义人道和民主自由的价值原则”^[11]政治行动对市场的干预要以保障公民的合理与合法利益,并以促进互惠互利和社会合作为准则,如此,随着公共性的复归,市场经济也将能够内生出稳定有

序的秩序,并健康发展和惠及大众,最终有助于实现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和谐互动。

[参考文献]

- [1]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4.
- [3]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4] 玛格丽特·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M].陈高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5.
- [5] 冯婷.消融在消费中的公共领域——读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J].社会学研究,2007(2):228-241.
-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
- [7] 邓伟志,秦琴.寻找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的探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12.
- [8] 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M].杨通进,李丽丽,林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87.
- [9]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0] 林义.波兰尼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及其启示[J].财经科学,2001(3):16-20.
- [11] 陈刚.波兰尼对自由主义市场乌托邦的批判[J].江海学刊,2009(3):51-56.

(责任编辑:朱德东)

Karl Polanyi's Theory on Market Economy and Its Political Value

ZHANG Ya-fu, ZHONG Wen-sh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Karl Polanyi criticized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 is Utopia, that the “double movements” in free market and social self-protection make the market self-regulation not be achieved and, based on this, a great social transition is constituted. Social self-protection movement spawned by the free market is, in essence, related to human condition, human condition is a source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s a result, political a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balance between society and market. Mutually preferential economy under the guide of the political value can friendly cooperate with society and it contains reciprocity and public connotation, which inspires us that we must uphold fairly-minded political value and return to public nature when we intervene market.

Key words: market; social movement; political action